

壹、前言

教育基本上是一種「希望工程」，是一項對於未來的改變懷抱有深切期待與高遠理想的志業。在西方的教育史上，不少學者在提供其教育計畫時，多半是以較為激進的方式提出，某些重要作品甚至更具有烏托邦的意味，例如 Plato (c.427- 347 B.C.) 的《理想國》(*Republic*) 以及 J. J. Rousseau 的《愛彌兒》(*Emile*)。惟不容否認的，在高舉教育與社會改革理想的文獻中，烏托邦作品常常帶來許多爭議。因為烏托邦具有「不可實現性」本質，加上其他某些特性，遂使其實現背後也蘊藏著許多危機。A. W. Green 就曾歸納了 Plato 到 G. Orwell 的烏托邦，認為其具備兩項共同特徵：一、既存的「現在」被視作可以用計算的方式來決定未來；二、至於所謂的「未來」則被認為是，其較所有的過去及現在都更強調知識份子的地位。前項天真地假定，透過科學理性主義及相關工程，再加上公共教育，必定可以產生我們想要的社會目的與目標；而後項則主張將烏托邦交與那些知識份子菁英治理，賦予其「世界控制者」(world controller) 的角色 (Green, 1952)。惟不論是何種特徵，都易讓烏托邦流於過度控制及獨裁專斷的危機。

除了烏托邦本身所引發的不安聯想外，教育也常因為其本身的某些特性，而忽略烏托邦思想的重要性。例如，現代社會中教育有所謂「去距離化」(de-distantiation) 的趨勢 (套用 K. Mannheim 的術語)，亦即教育愈來愈強調貼近日常生活需求 (Papastephanou, 2008, p. 89)。再加上，教育活動向來即對脈絡背景具備一定的敏銳性 (sensitivity)，致使其很容易即接受市場目標的影響 (Young, 2003)。而這種教育目標與日常生活及外在目標的近似性，也常使教育工作者無法體察那些較為遙遠或全面的教育目標。這也就是如 Bickman (1998) 所言的，學校的改革者一直未能「朝向烏托邦來調整」(tinkering toward utopia)，卻只是倒退回到習慣，迂迴地再回到平庸。簡言之，這種「去烏托邦式」的思考習慣，很容易讓教育工作者重回將教育視為日常例行之事，因而在教育事務的處理上流於慣性思考。

基於前述原因，過去有關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其實鮮少特別針對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烏托邦進行系統探究，經研究者透過網路及期刊文獻進行初步搜尋，以往僅有波蘭學者 Meczowska (2005) 發表的〈邁向教育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Towards utopianism of educational thought) 一文曾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探究。

不過近年來，西方似乎又重新燃起探討烏托邦教育哲學的風潮。這可能是由於學者體會到，即便在一個講求新奇、績效、實用、改變的現代社會中，重新採取「理想社會」(容或可能是烏托邦式) 的觀念，作為教育中哲學辯論的起點，仍有可能獲致豐碩成果 (Suissa, 2001, p. 643)；因其至少可以協助我們重新思考當前教育實踐中的各種預設，保持我們對於教育的想像力與批判力，甚至能夠有勇氣提出自己的論點進行理性論辯。依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來看，10 年來就已有不少英文文獻與烏托邦的教育哲學有關 (Davis, R. A., 2003; Giroux,

2003a; Halpin, 1999, 2001a, 2001b, 2007; Leonardo, 2003; Lewis, 2006; Milojevic, 2003; Olssen, 2003; Papastephanou, 2008; Suissa, 2001)。此外，更有學者從「希望教育學」的角度重新闡述了 H. Marcuse、E. Bloch、P. Freire 與 I. Illich 等人的思想，希望藉以重建教育 (Kahn & Kellner, 2007; Van Heertum, 2006)。

在上述諸作者中，特別是 Halpin 不僅寫作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且更於 2003 年出版了《希望和教育的教育》(*Hope and education*) 一書，深入探討了「烏托邦想像」(utopian imagination) 在教育中的角色。另根據 Halpin (2001b, p. 300) 與 Papastephanou (2008, p. 91) 的觀察，2000 年後在哲學與教育哲學的學界對於烏托邦的關注確有重新興起之勢，包括一系列的專書、期刊專號與研討會等，都再度點出了「烏托邦想像」的觀念。

綜合前述分析，與烏托邦思想有關的教育探究，在西方似有重新獲得重視之勢，而且此次烏托邦的研究熱潮除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外，尚結合了對於教育實踐價值的重視。從研究者的角度看，我們除對於此股國際性學術潮流應予以正視外，對於教育史研究的工作者來說，重新針對過往著名的與教育有關的烏托邦著作中之教育學說及其意涵重新進行有系統的檢視，以再度發掘那些先知先覺者具有突破現實之想像力的教育智慧，這在一個所謂「去烏托邦化」的世界 (Giroux, 2003b)，並且出現所謂「公共時代危機」(crisis of public time) (Giroux, 2003c, p. 146) 的社會中，應該仍算得上是一種頗有價值的嘗試。

有鑑於前述背景，在西方眾多烏托邦教育思想文獻中，研究者選擇了 Plato 與 Gilman 這兩位一古一今的學者之烏托邦作品，進行比較分析。而研究者之所以以其為研究對象，係基於下列原因：

一、《理想國》與《她鄉》(*Herland*) 均可分別視為 Plato 與 Gilman 最重要的教育代表作品。以 Plato 的《理想國》來說，應該是西方教育史最早的一部重要教育作品，這是歐洲史上第一次有人對教育進行系統的理論闡述，如果我們除了想瞭解歐洲各國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政策之外，還想對全世界所有受歐洲殖民影響之地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有所瞭解，那麼《理想國》就是首選著作 (Flanagan, 2005/2009, p. 12)。另外，Holmes (1967, p. 305) 亦認為 Plato 的《理想國》提供了歐洲教育圖像的基本假定。因此在教育思想史上，《理想國》向來就被視為西方教育思想的開山經典之作。

至於 Gilman 於二十世紀所著作的《她鄉》則備受女性主義者青睞，並被不少女性學者視為其教育代表作。例如 Martin (1985, p. 139) 即在其《重啟對話》(*Reclaiming a conversation*) 中，曾專章探討 Gilman《她鄉》中的教育學說，認為其能提供我們另類的社會及教育之視野。而另位女性學者 Maloney (1999, p. 109) 則認為 Gilman《她鄉》中提供了一種「社會母職」(social motherhood) 的觀點，使得教育成為一種集體的、人性的與社會的功能。再來，Gilman 在該書中亦提出了許多革命性的教育觀點，如將「生長」視為《她鄉》社會中的基本原理、強調自然、無意識的學習形式等，這些都代表了《她鄉》在教育思想上的重要地位。